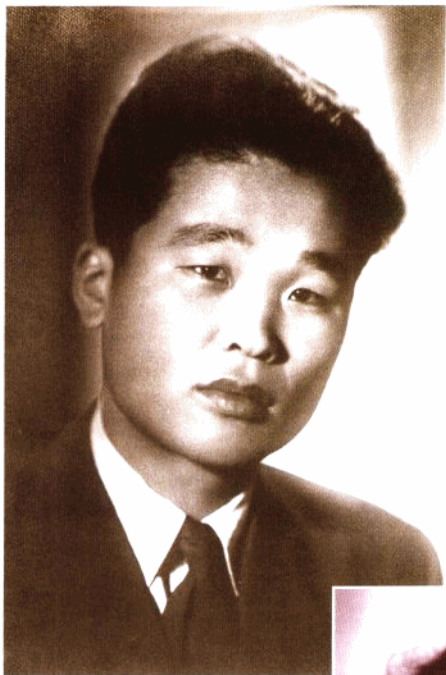


# 我和我的妻子

● 郑判龙 著

民族出版社

PDG



留苏时期的郑判龙



郑判龙的妻子王瑜于  
1956年在莫斯科



1992年3月在俄罗斯  
斯海参崴



1997年3月到韩国  
参加第五届“海外同胞  
奖”颁奖仪式

## 编者的话

我的丈夫郑判龙在治疗癌症的病床上,开始构思《我和我的妻子》这部长篇作品。他在动完手术,开始进行艰难而漫长的化疗以及手术后的病情复查等第一阶段的治疗告一段落以后,立即开始边配合医生的治疗,边着手写作。他写这部回忆录有两个初衷。首先,他这本书是为我而写的,是为了还我对他的情。老郑说过,因为我嫁给了他这个来自山沟的朝鲜族知识分子,才会来到当时很穷很落后的这个边远地区,为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辛苦工作了一辈子,同时,也支持了他的一生的事业。他想把我们两个人的生活和工作经历写出来,并以我的故事为主线来写这本书,以便让读者不仅通过他过去出版的作品了解他,而且也通过这本书了解我。其次,他于90年代初写的《风雨五十载》只写到他80年代末的经历,因此把《我和我的妻子》作为《风雨五十载》的续编。他想把他90年代的经历写给读者,从而对他在20世纪的人生经历也有个完整的交代。

老郑与《延边妇女》杂志社签约连载这部回忆录,计划共写30个短篇,每期供5000字的稿件一篇。《延边妇女》杂志在2000年第5期刊登了他的第一篇文章。他知

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便加紧写作，共写完了 20 篇，约 10 万字，可惜还是只写到 80 年代的故事。2001 年 8 月中旬的一天，他在我们的帮助下，从医院回到家里，把已写完初稿的最后三篇文章放进信封，打电话给编辑部，请他们派人来取稿件。后来，由于病情急剧恶化，再也没能写下去。

老郑在临去世前谈到这本书时对我说：“《我和我的妻子》是为你写的，可惜我没有完成它，很对不起。”我对他说，我可以接下去写，因为这本书写的是我们两个人的故事，我也熟悉这方面的内容。我让他把后面 10 篇的标题和打算写的内容告诉我。后来《延边妇女》的主编等来医院探病时，也建议他把想写的内容讲给我听。遗憾的是他只告诉了我两个题目，后来他的神智越来越不清晰，我也不便追问。老郑去世后，一些朋友支持我接着写这个回忆录。我从未涉足过文学创作领域，但想到我对老郑有过的承诺，就试着动手写了。由于不知道他想写什么内容，我选了在 90 年代期间与我们两人都有关系的较突出的几个话题，写了 6 篇文章。我用汉语写，编辑部负责翻译成朝鲜文，继续连载。这样，《我和我的妻子》虽一共只完成了 26 篇，而不是老郑原计划的 30 篇，但基本上实现了他对本书的设想。

供杂志社连载的文章写完后，我想起老郑生前曾有过将这些文章译成汉语，出一本书的愿望。他对我说过：“我写了不少东西，遗憾的是我的汉族亲戚和汉语读者们看不懂。《我和我的妻子》写完后，我要把它翻译成汉语，

出一本书,让他们也了解我和你共同生活的故事。”因此,我决心完成他这一遗愿,出版这本书。在编辑此书的过程中,考虑到《二十世纪中国朝鲜族文学史料集》第22集《郑判龙文学篇》已选登了他90年代写的部分日记,我从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写的2000年1月1日到2001年8月3日的日记中摘录了130篇,附在这本回忆录的后部,以便读者了解他努力与绝症作斗争,争取延长生命,为社会多做贡献的毅力和精神。同时,在本书最后附有《郑判龙年谱》,目的是使汉语读者大致了解我的丈夫一生所从事的事业。

本书由郑判龙、王瑜、雷子金三人合作完成。《我和我的妻子》第1到20篇文章由郑判龙用朝鲜语写作;第21到26篇文章由王瑜写作;第1到第20篇文章以及《郑判龙日记摘抄》两部分由《延边日报》社的高级翻译雷子金先生翻译成汉语。《郑判龙年谱》选自金顺女编、徐东日译成汉语的《郑判龙教授论著论文评论作品资料目录》;全书由王瑜统稿。

王瑜

2002年4月30日

## 目 录

### □ 我和我的妻子/1

1. 爱情是自然到来的/3
2. 留学时期的罗曼司/8
3. 格鲁吉亚女歌手斯佩拉/13
4. 与她相遇/18
5. 悠悠流淌的伏尔加河/20
6.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25
7. 初吻/30
8. 结婚/36
9. 棘手的选择/41
10. 初尝艰辛/47
11. 伟大的单纯/53
12. 朝鲜族婆婆与汉族儿媳/60
13. 汉族岳父母与朝鲜族女婿/66
14. 妻子住院治疗与无穷花/73
15. “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次洗礼/79
16. “牛鬼蛇神”的“劳改队”生活/85
17. 舍己精神的又一例证/91
18. 经受考验/95

- 19. 妻子改教英语/102
- 20. 莫依拉和我的妻子/109
- 21. 儿女们/117
- 22. 重新与俄罗斯结缘/128
- 23. 为发展英语教育事业共同努力/136
- 24. “海外同胞奖”和奖学金/145
- 25. 老郑患了绝症/153
- 26. 艰难而不幸的 2001 年/162
- 郑判龙日记摘抄/171
  - 2000 年日记摘抄/173
  - 2001 年日记摘抄/201
- 附录/225
  - 郑判龙年谱/225



# 我和我的妻子



## 1. 爱情是自然到来的

西方有位诗人在他的一首诗“爱情是怎样到来的？”中，认为爱情来得很自然，它扣动人们心弦的那一瞬间，大概称得上是人间的一种永恒的神秘。他所说的爱情，显然不是指那种闲得无聊而去寻觅异性伴侣，或者到了婚龄便结婚生儿育女的那种廉价爱情，而是指真正意义上的爱情。爱情是一种精神上的原动力，它使人们一见到对方就心醉神迷，掌心沁汗，魂牵梦绕，挥之不去。它是一种忠诚和爱慕，不可须臾或缺，令人可以为之牺牲一切。它不可强求，是一种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神秘感情。

1952年12月，我在延边大学毕业后，21岁就当上了助教。我生长在北满朝鲜族聚居的农村，原来是个土老帽，而今一毕业就留校当助教，在当时确实足以令人刮目相看。

由于身份有了这样的变化，我家里的长辈和周围的亲戚朋友们纷纷劝我快快成家。我知道他们是出于好意，可我却无法接受。和我一起毕业的大多数同学都想去北京、沈阳和长春等大城市的重点大学继续深造，我也决心继续努力、进修，增加学识，并不急于觅妻成家。但

当时在朝鲜族聚居的地区依然实行早婚,不少小伙子一过20岁就已结婚。和我同一届毕业的一些同窗好友毕业后也结婚了,有的人还有了子女。在这种情况下,我虽然不打算仿效他们,却感到有必要先谈谈恋爱,否则大学毕业了,连恋爱都不会谈,实在让人看上去有点不近情理。

当时在朝鲜族社会里,自由恋爱还未形成风气。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决定终身的现象虽然减少了,但兴起了经人介绍而找对象的做法。当时有不少先结婚后恋爱的情形。其实,何止当年,现在不也有许多年轻人是通过他人介绍找到了对象,在双方认可之后才谈起恋爱的吗?所不同的,只是当时的这种做法比现在更加流行而已。

那时,我寄宿在现在的延吉市西市场附近建设街的一户人家里。女房东几次要给我介绍女朋友。一次,她郑重其事地给我推荐了一个姑娘,说她是汪清县某小学的教师,长得很不错,为人善良,她的家庭境况也无可挑剔。

相亲那天,这个女教师来到我们住的这户人家。我的同学金显根陪我和她见了面。由于过去彼此完全不认识,我同她寒暄后,只作了短暂的交谈。她的相貌长得还算清秀,人看上去也善良。她似乎一见面就对我颇有好感,因而话也说得比较多,并婉转表示想进一步接近我。然而我对她没有兴趣,坐了一会儿,便找借口同金显根一起到学校去了。当晚,女房东问我对这位女教师是否满

意,我答道:“正像你所说的那样,她长得还可以,性格看来也很好。只是婚姻恋爱应该是情投意合的,我和她只见过一次面,还谈不上互相了解。”我这么一说,她以为我已经动了心,就说:“见几次面就会互相了解的。今后,你们要多来往。”后来她还告诉我,女方对我很满意。看来,当时只要我答应,这事就会成。然而我后来没有和这个姑娘继续交往。因为尽管并未发现她有什么使我不满意的地方,我却没能找到任何使自己动心的兴奋点。我认为,爱情只能听其自然,不能操之过急。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只能是枉然,强扭的瓜不甜。几天后,这件事就过去了。

现在在平壤的黄贵轩老师曾邀请过我们这几个刚开始工作的未婚青年教师到她家做客。我们念大学一年级时,她给我们讲授过《社会发展史》。她的丈夫裴克先生当时是中共延边州委宣传部的部长。黄老师平易近人,我们这些毕业后工作时间还不长的助教知道她是部长夫人,不敢随便与她接近。那天一听说要到裴部长家做客,我们还真不知所措。我问她为什么要请我们,她说:“你们到我家就知道啦!不必过于紧张,只是得穿得整洁一些。”她让我们下个星期日到她家去吃晚饭,并说裴部长也可能在场。我们进一步打听,她才告诉我们:“北京的中央民族歌舞团有几位女演员来延边文工团学跳朝鲜舞,她们也和我们一起吃饭。我让你们穿得整洁一些,是为了不使客人们觉得你们土里土气。”听到要和北京来的女演员见面,我们觉得好奇而高兴。至于穿着,当时谁都

穿灰色和深蓝色中山装和白衬衫。所谓穿得整洁一些，无非是说穿得干净一些，如有可能，穿新一点的衣服罢了。

星期天晚上，我们穿着洗得干干净净的中山装到了黄老师的家里。她家在现在的青年大厦附近。我们进屋时，从北京来的女演员们已经到了。黄老师在厨房里忙着做菜，裴部长则亲自到门口把我们迎进客厅，介绍给那几个女演员。如今时兴交换名片，而那时我们只是互相口头介绍了各自的名字和工作单位。

原来她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北京成立的中央歌舞团和民族歌舞团的演员，为了公演朝鲜舞，特地到延边文工团来学习的。她们都是朝鲜族姑娘，由于是从全国各地选拔出来的，容貌和身材都很好。尽管文化水平不高，但可以肯定，她们都会有很好的前途。

裴部长和黄老师之所以安排这次晚餐，是因为我们是大学刚毕业的朝鲜族优秀青年教师，而她们都是思想品德和容貌身材一流的朝鲜族姑娘。他们夫妻俩想让我们这些朝鲜族俊男靓女互相认识认识，以便促进我们的感情。

几天之后，黄老师见了我，第一句话就问我有没有看中她们中的哪个。如果有中意的，裴部长和她会帮我把她调到延边文工团。如果我们几个助教中有谁想到北京落户，与她们成家，他们夫妻俩会想办法帮助的。

那天晚上，我们同她们一边吃饭，一边畅谈各自的理想和打算。我对她们说，我还年轻，想进一步深造，从而

提高自己的素质。平心而论,她们这些来自中央的演员,在朝鲜族姑娘中可以说是绝色佳人,而我们这些大学的助教却土气未消,加上一个个都相当腼腆,在第一次见面时,竟然没对她们说出一句体贴对方的话来。现在,延吉市有的是歌厅和舞厅,青年男女完全可以利用它们来增进了解和情谊。而当时没有这等设施,我们吃了晚饭就与她们分道扬镳了,后来也极少有再次见面的机会。但她们的名字我却至今记得一清二楚。

几年后,我在莫斯科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遇见了一位曾在黄老师家一起吃过晚饭的女演员。那时她已是中国著名的女舞蹈家之一,并因在联欢的演出中担任《孔雀舞》的领舞而获得金质奖章。我想起1953年那天晚上与她的邂逅,就对她说:“当时如果我们真的谈上了恋爱,现在会是怎样呢?”她只是含含糊糊地说了声:“是啊!”显然她不像我这样还记得那次见面,早已把它忘掉了。

当时,在延边文工团的女演员中也有一个我认识的姑娘。她和我同在黑龙江的一个村子里长大。由于从小认识,长大后又都来到了延吉市,彼此之间曾相处得很好。有段时间,她对我有些好感,每次回家乡探亲都去我家走动。然而我们的友情没有发展成为爱情。爱情确实是一种缘分,不能靠人为的撮合,也不能单纯靠经常的接触而形成。爱情是自然而然地到来的。

## 2. 留学时期的罗曼司

1954年夏天,我得到被选上去苏联留学的通知,真是喜出望外。

1954年5月的一天,朝文系主任金昌杰老师从教务处回来,告诉我们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他说:“朴奎灿教务长在今天的系主任会议上传达了一项教育部的指示,从今年起在全国范围内通过考试招收去苏联的留学生。留学的本科学生从大学一年级在校学生和应届高中毕业生中选拔,研究生从大学的在职教师中选送。我校的教师也可以参加留学研究生的考试。校方的意见是各系分别挑选一两名青年教师参加留学苏联的研究生考试。”在座的教师听了这一出乎意料的喜讯,无不欢欣鼓舞,想到我们这所边疆地区的学校也可以有去苏联留学的研究生,好像做梦似的,便纷纷议论起来:

“既然是招收研究生,就该有对口的专业。难道苏联也有和我们朝文系对口的专业?”“苏联的大学大概没有朝文系。听说苏联过去有过一所类似我校这样的朝鲜族大学,可是它现在已经停办了。”

金昌杰主任听了大家的议论后说:“我也听说在苏联的大学里,没有和我们这个系对口的学科,只有苏联文学这一门课程还沾上一点边。像俄语这样的专业我们才开始筹建,而像朝鲜语言文学这样的专业,苏联的大学里又没有。”他这么一说,大家就把视线投向了。我虽然不



是学苏联文学的,当时却在讲授文学名著选读课,讲过几篇俄苏文学作品。大家认为我年轻,有进取心,只要肯努力,就会有成功的可能性。

我起初有些犹豫。后来想想,即使不成功,也能学到不少东西,为何不试试呢,就毅然报了名。1954年夏天,延边大学大约有10多名青年教师参加了留学考试,结果我被录取了。延边农学院的朴景汉老师和延边医学院的姜顺求老师也通过了考试。这年秋天,我们三人高高兴兴地去北京俄语专科学院(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留苏预备部报到,参加出国前的俄语培训。

1955年夏天,我们结束培训后到了苏联。莫斯科大学曾是我仰慕已久的世界最高学府之一,而此时我已成了这所大学的苏联文学研究生。这样一来,随着身价提高,向我求爱的姑娘也多了起来。我到苏联后不久,就收到几封来自国内的女生的信,内容大多是表明她们对我爱慕已久,希望今后多写信联系。我到苏联时,年纪不到25岁,确实是姑娘们较好的求婚对象。当时,苏联和中国是最友好的邻邦,在苏联人中喜欢中国的人特别多。于是,有些苏联姑娘也想同中国男生恋爱。

每逢中国和苏联的节日自不用说,就是平时,苏联的青年组织也常常邀请中国留学生同苏联男女青年联欢,一起唱歌跳舞,增进友谊。尤其在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苏联不论哪个年龄段都是女人多于男人。有许多寡妇和老处女。莫斯科大学语文系的系歌里竟有这样的句子:“男生太少,女生不免寂寞又苦恼。”于是我